



街头遮阳棚,装与不装多听民意

本报评论员
高路

对于这样一个民生工程,装与不装都需要及时与市民沟通。如果不装了,也希望给个明确的说法。

烈日骄阳下,非机动车道上的遮阳棚能为市民带来一片清凉。可是直到现在,市民发现原本5月份就会在杭城街头出现的遮阳棚仍未见踪影。

遮阳棚到底装不装,引来大量市民关注。6月29日下午,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几位记者前往主城区多个路口,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,听了听大家对于路口遮阳棚的意见。认为“有必要安装”的市民居多,占了调查人数的多数。

遮阳棚得到这么多市民的支持和认可,是因为难耐高温,也难舍曾经的这份清凉。夏日的杭城堪称“火炉”,经过暴晒以后,地面温度很高。稍稍待上那么几分钟,就感觉

人都要化了。红绿灯路口,路面比较开阔,行道树解决不了作用,暴晒的情况更严重。杭州夏天持续时间特别长,从五六月份一直要到9月份,对骑车的人而言,这是不小的考验。

可以想象,当路口出现这么一顶遮阳棚,以及沿路一顶顶遮阳棚为大家撑起一片清凉时,对骑车的市民来说,是怎样的一种慰藉。遮阳棚送出的这份凉爽,虽小却弥足珍贵,极具人情味,它有效地缓解了非机动车主在等候红绿灯时的焦灼。

从2008年开始,每到5月,杭城各大路口就会竖起遮阳棚,遮阳又避雨,成为夏季街头的一道人文风景。这一顶顶遮阳棚,体

现了对民生问题的重视,写满了这座城市的真诚和贴心,让大家从细节中体会到一座城市人性化的一面。大家自然希望能一直坚持下去,成为城市文明一张闪亮的名片。

管理部门不妨作个详细的调查,看看市民的支持率怎样?也可以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,安装使用维护等方面遇到的问题怎么解决?遮阳棚可不可以设计得更美观时尚一些,以及是否可以长期的设计和安装……总之,对于这样一个民生工程,装与不装都需要及时与市民沟通。如果不装了,也希望给个明确的说法,是资金问题、维护问题,还是别的什么问题?这样也能打消市民的顾虑和猜忌,取得市民的理解和支持。

一顶遮阳棚,背后是一座城市的人文关怀

读者

关于杭州街头的夏日遮阳棚为何还不装的街头调查和报道,通过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客户端、钱江晚报官方微信和官方微博等平台发布后,受到了大量用户和网友的关注,他们纷纷发表意见。以下是我们选取的部分评论。

陶然:以前的遮阳棚装得很人性化,为什么这两年不装了?路口没有遮阳棚,我现在骑电动车都带雨伞,遇到红灯就打开。

彩虹天:同问,为什么今年还是没有呢?太晒了!

紫枫灵:虽然我没电动车,但还是觉得装起来好,这样更人性化!

pan的小花园:有些地方红灯时间还特别长,比如萍水西街古墩路口,一个红灯要

很久,37℃的中午,人都要熟了。

Peng懵懵:就早上上班骑了一趟,没戴手套直接晒出了分割线。每一个路口都暴晒啊,而且红灯都好长。

陈陈陈皮糖啊:没有的时候也就没有了,有了以后再没有,就接受不了了。

富婆姿是我啊哈哈:我们老家小县城学杭州,现在还有遮阳棚,为啥现在杭州倒没有了?

普生HZK141:杭州是一个比较有人文气息人文关怀的地方,不要把原来的好传统丢掉啊!

着的奄鸟享鸟:学下宁波,做成固定的。拆了又装,装了又拆,路面全是膨胀螺

丝打的孔。

落叶寒枫:台州市区的遮阳棚,基本上都是长久性的。

老大你在哪!:原有的遮阳棚好像只挡住一半非机动车道,完全可以铺得更宽更长一点。如果这样设计的话,那等红灯的人应该会自动地在路口排队,就不太会影响骑车人右转了。

anne:短期可以遮阳棚,长期还是应多栽树。

水水:以前马路边和人行道上都有高大的树木,骑车在树荫下也凉快。现在修路修完,好多地方树木都移走了,重新栽种的树苗又小得可怜。

行程卡“摘星”,不代表可以太放松

6月29日,工信部官网发布消息称,即日起取消通信行程卡“星号”标记。消息发出后立刻引发舆论关注,并成为社交媒体热搜榜第一,网民为之“喜大普奔”,旅游出行意愿高涨。

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即市民俗称的“行程码”,通过用户手机所处的基站位置获取,可以查询本人前14天到过的所有地市信息。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,如所在城市存在疫情,且存在着中风险或者高风险地区时,行程码并不会变色,但会用“星号”来标志。虽然带“星号”并不表示用户实际到访过这些中高风险地区,但一旦行程卡“带星”,就会遭遇种种不便。有些地方以其为限制人员、货物流动的依据,“一刀切”地隔离、劝返。

行程卡“摘星”是继卫健委28日将入境者和密接者的隔离时间从“14+7”缩短为“7+3”天后,又一个新冠防控具体措施的优化调整,体现了精准防疫的理念,对于促进人员流动、活跃经济发展,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。

不过,有人对“摘星”仅表示谨慎乐观。据网友反映,之前就有地方已经出现了“星星”的替代品:有的地方亮出了大大的“!”;有的地方则用不同颜色标示风险程度不同的人群,同时对其采取不同的限制政策。

取消“星号”标记,是落实党中央“疫情要防住、经济要稳住、发展要安全”明确要求的具体体现,有利于真正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。如果不能深刻领会精神,有形的星星没了,各种“变形”或“无形”的星星依然难以消除。

当然,摘星是防控标准统一,提高各地执行效率的一种手段,并不意味着疫情防控政策放松,可以随意“浪”了。当前,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的压力还很大。要克服麻痹思想、厌战情绪,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不误。

行程卡“摘星”释放了诸多积极信号,但公众不能忘了防控工作的重要性。出行前要了解清楚当地的防控政策,注意避开疫情地区,做好个人防护,珍惜来之不易的防疫成果。

14年寻子痛,该如何抚平

苦苦寻子14年,人贩子被建议判刑5年,而5年已经是拐骗儿童罪的最高刑罚了!接到检方的《量刑建议书》,孙海洋大为震动,仿佛14年前的“余震”袭来。

寻回儿子孙卓半年多,一份来自检方对“孙卓被拐案”给出的量刑建议书,再次将孙海洋拉回到公众视野。检方认为,嫌疑人吴某龙拐走两个儿童,性质恶劣,建议对其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虽然律师解释说,5年已经是拐骗儿童罪的顶格量刑,可孙海洋不甘心。14年等待,14年煎熬。他决定对吴某龙发起民事诉讼,赔偿金额为500万元。

确实,公众出于朴素的情感,与孙海洋一样,对检方的量刑建议形成了较大的期待落差。同是拐走儿童,刑法却有“拐骗”与“拐卖”两个不同的罪名。前者“拐”的目的是收养,后者“拐”的目的是贩卖牟利。在本案中,在没有买卖证据的条件下,只能对嫌疑人以“拐骗儿童罪”处罚。

厘清拐骗儿童罪与拐卖儿童罪,可以廓清公众的疑虑,却难以抚平众多孩子被拐家庭的创伤。且不说,“拐骗”本来就是“拐卖”的一种手段,人贩子是不是拿了孩子卖钱,对受害者家庭造成的骨肉离散,并没有本质上的危害不同。而且在实际的案例中,人贩子被捕后因为买卖证据无从获取,最后被轻判的不在少数。

这也成了孙海洋重新投入战场的重要原因。虽然14年的寻子之痛和精神折磨无法用金钱衡量,但还是希望通过更合理的量刑和赔偿,对不法分子起到震慑作用。

特约评论员
胡欣红

摘星是防控标准统一,提高各地执行效率的一种手段,并不意味着疫情防控政策放松,可以随意“浪”了。

本报评论员
陈江

虽然14年的寻子之痛和精神折磨无法用金钱衡量,但还是希望通过更合理的量刑和赔偿,对不法分子起到震慑作用。